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 文化与文学论丛 ·

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



Zhishifenzi Yingxiang yu Wenxue Huayuchang

刘忠◎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背负着太多太多的沉重，“立人”与“立国”的双重使命搅动着他们的心绪，个性的世界让他们迷醉，革命的光彩同样令他们神往。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歧路、左与右的位移，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窘境，也是今天我们考察他们心路历程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上海文化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

刘忠◎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 / 刘忠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5
(文化与文学论丛)
ISBN 978-7-80740-416-3

I. 知… II. 刘…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622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装帧设计

汤 靖

书名

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cl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6 千字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416-3/I·544

定价

30.00 元

敬告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65410805

序

杨剑龙

从文化的视角探究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事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种现象，这尤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国门，国外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地被介绍进来，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更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文学便成为一种倾向，这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观照研究文学，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究文学背后的文化现象与原委。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借鉴西方新批评方法的囫圇吞枣不同，在文学的文化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比较清醒与深入的境况，在深入研究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以比较贴切深入的方式展开文学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这辑“文化与文学论丛”共为四本，《文化的震撼和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杨剑龙）、《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杨剑龙）、《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钱文亮）、《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刘忠）。杨剑龙的著作将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两部著作分别编入了这两个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钱文亮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其著作努力从“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这一角度，彰显其丰富的文学史意蕴，取得对20世纪中国文学更充分的观察与理解。刘忠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其著作上编选取六位代表作家，论析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心灵轨迹；下编以问题研究的方式，探寻新时期文学话语的

变迁及内在逻辑演进。这几部著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化大背景中、运用文化批评的方式，成为丛书的一个共同倾向。

改革开放后，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学科的发展与竞争离不开人才的引进，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便是依靠着人才引进而不断发展的，我是于198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后来上海师范大学的，后来又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钱文亮、刘忠是先后引进的人才，对于充实与发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辑“文化与文学丛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显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本辑丛书本计划学科点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每人一部，但是有的教师的著作已出版，有的教师手头尚未完稿，因此暂且编辑出版四部。倘若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出版“文化与文学论丛”第二辑、第三辑。

是为序。

2008年8月于瞻雨斋

目 录

CONTENTS

上编 知识分子影像 / 1

第一章 一个启蒙战士的生前事与身后名——鲁迅论 / 2

第一节 性格形成与知识分子谱系 / 2

第二节 “兄弟失和”与遭受围攻的日子 / 9

第三节 与政治、政党的关系 / 19

第二章 在党的文艺干部与理论家之间——周扬论 / 24

第一节 身陷“左联”内部矛盾旋涡 / 25

第二节 把文艺批评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 / 33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先扬后抑”的表现 / 43

第四节 从“左”到“右”的位移 / 47

第三章 主观战斗精神与受难意识——胡风论 / 53

第一节 寒门走出来的革命作家 / 54

第二节 卷入左翼文坛内部斗争 / 58

第三节 “五四”新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 / 66

第四节 接踵而至的批判运动 / 80

第四章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论 / 88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丁玲——“莎菲”式的叛逆 / 88

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丁玲——革命中的“革命” / 96

第三节 新时期的丁玲——“左”与“右”的换位 / 103

第五章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王实味论 / 108

第一节 没有赶上潮头，却被意外地推向波峰 / 108

第二节 所处位置并不显眼 / 110

第三节 历史往往就这么神奇 / 115

第六章 文艺界的独行侠 精神界的流浪汉——萧军论 / 118

第一节 阴沉的土地和不屈的灵魂 / 118

第二节 仁侠尚义的性格与跌宕起伏的人生 / 124

第三节 说不尽的萧军和萧红 / 134

下编 文学话语场 / 143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 / 144

第一节 浪漫主义的表现形态 / 146

第二节 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心态 / 151

第三节 浪漫主义的新变及走向 / 153

第二章 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 / 156

第一节 寻根文学与地域文化 / 156

第二节 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 161

第三节 寻根文学与山野精神 / 164

第三章 “第三代诗人”的身份认同与诗学观念 / 169

第一节 身份认同：从“崛起”到“突围” / 169

第二节 诗学观念：从精英到平民 / 172

第三节 诗人身份：从“无饭”到“饿死” / 179

第四章 “先锋”远去与小说“回家” / 183

第一节 先锋与先锋小说 / 183

第二节 先锋远去与小说回家 / 191

第五章 现代性视野中的城乡叙事 / 195

第一节 乡土经验的滞重和怀想 / 195

第二节 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双重变奏 / 200

第三节 都市化进程中的“底层文学” / 202

第六章 西部文学与外省批评家 / 207

第一节 “西部文学”不是一个自觉的概念 / 207

第二节 “外省批评家”的尴尬处境 / 211

第七章	文学话语场的混乱与澄清 / 214
第一节	文学功能的多样化 / 214
第二节	作家身份的专业化 / 216
第三节	批评家队伍的职业化 / 218
第四节	读者接受的娱乐化 / 220
第八章	“讲坛”上的知识分子及其凌乱的舞蹈 / 224
第一节	“讲坛”上的知识分子 / 224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凌乱舞蹈 / 226
参考文献 / 230	
后 记 / 232	

上编

知识分子影像

鲁迅论：一个启蒙战士的生前事与身后名

周扬论：在党的文艺干部与理论家之间

胡风论：主观战斗精神与受难意识

丁玲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王实味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萧军论：文艺界的独行侠 精神界的流浪汉

第一章 一个启蒙战士的生前事与身后名

——鲁迅论

——作为一位启蒙知识分子，鲁迅的伟岸与高大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文字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散发着生命的热度，穿越历史，向你涌来，令你无法回避他的辐射。

鲁迅身上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解读鲁迅，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路径，赞之者颂其为一代文豪、民族精魂，贬之者称其为封建余孽、世故老人。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好，说他是“二重反革命”、“老石头”也罢，历史自有公论。不过，作为一位启蒙知识分子，他的伟岸与高大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历久而弥新，他的文字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散发着生命的热度，穿越历史，向你涌来，令你无法回避他的辐射。

第一节 性格形成与知识分子谱系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

口周家，过去的文学史上关于他出身的介绍，说是破落的地主阶级家庭，其实不然，周家为当地望族，土地与房屋丰裕，收入可观，加上家里有读书人，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气派很大。祖父周福清，鲁迅称其为“介孚公”，举人出身，点翰林，自称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后人，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周家诗书传家的历史长达七八百年之久。祖父，才学丰赡，却清高孤傲，好批评，喜讽刺，“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多招怨恨。“对某人、某事批评实质上没含什么恶意，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① 鲁迅身上遗传有祖父这种直言不讳的因子，他性格中耿介、敏感、偏激的一面似乎都与此有关。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祖父的性格这一点不可不提。祖父对周氏兄弟的教育极为严格，希望后辈能学有所成，考取功名，传承家道。为此，他制定了一套颇有启发的教育秩序，鼓励孙辈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小说作品，至于读诗，最好是“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②。这种通达平易的教育方式，即使放在今天也颇有新意和启发。鲁迅后来喜欢诗文和历史，与祖父的家训不无联系。

与祖父相比，父亲周伯宜的命运可谓坎坷，身体孱弱不说，科考也一直不顺，结果只捐了个秀才，算是保住了诗书家风。据周作人回忆，“父亲平时吃酒时往往兴致很高，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因为科场失意，身体多病缘故，父亲自觉比祖父要窝囊一些，自然对儿子寄予的希望就更大些。这些，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大体可以寻到一点影像，孔乙己身上多少留有父亲的印痕。

1893年春天，父亲以周用吉的名字去杭州参加乡试，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不幸，事情败露，为了保住祖父的性命，周家变卖土地和财产打通

① 转引自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② 观鱼：《回忆鲁迅家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

关节，疏通官员，算是从秋后问斩减刑至入狱七年。贿赂主考官，这在清代科场应试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祖父科场案”后，周家由盛转衰，为了躲避株连，周家把刚刚年满12岁的鲁迅、8岁的周作人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变故”给年幼的鲁迅造成的心灵伤害是巨大的。还没来得及编织美好未来，却过早地经历了人生悲欢起落，他从此步入到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外婆家避难的这段时光，他人生第一次品尝到被压迫、遭歧视的痛苦，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的感觉始终排遣不去。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依然难以释怀。《呐喊·自序》中，他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片言只语，依稀见出鲁迅内心的苦痛。家庭变故加快了鲁迅的早熟，使他很早就学会了以一种怀疑而不失冷静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了几多稚气与天真，多了几许持重与老成，后来，经历过父亲的病故、幻灯片事件、兄弟失和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他对人性的幽暗与世事的多变感触得更多更深。难怪有评论家说，鲁迅甫一登上文坛，就以其思想的深刻、形式的独特而引人注目，赢得“文坛老人”之誉。

“祖父科场案”后，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小姑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治父亲，身为长子的鲁迅一面变卖家产，一面四处求医，整整4年，他差不多每天出入当铺和药店，“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当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声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可以想见，一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忍受着巨大的悲哀，一遍遍地希望着，又一遍遍地失望着，内心的压抑与悲愤有多么巨大。《父亲的病》中，记录下了鲁迅这段悲哀而又怨恨的经历，他后来对中医的绝望和偏见，与这一时期四处求医而又未能挽救父亲生命的痛苦记忆有关。鲁迅多疑、敏感的性格形成固然与遗传、天性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也是不可低估的。十三四岁以前，他对世道人心的想象偏于美好，所以现实对他的打击总是令他意外，因为意外就格外孤愤，因为孤愤就格外辛辣。现在，有研究者夸大鲁迅性格中负面因素，推说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心理阴暗、仇视他人等，

我倒认为，性情上的偏狭、多疑、敏感恰恰表明鲁迅天性上的淳厚和真实；理想世界与经验现实的巨大反差，给他带来心理落差与精神刺激，渐趋“世故”是不难理解的。

在鲁迅的受教育过程中，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深远，令其终生难忘，这三位老师分别是少年时代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藤野严九郎先生和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无论是三味书屋的私塾诵读，还是师从章太炎研习小学、整理野史，以及师从藤野严九郎先生学习医学，鲁迅对传统文化都是不陌生的，也许是知之愈深，恨之愈切，他不仅对中医抱有今天看来不无偏颇，或者说是极具个人感情色彩的看法，而且对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有着超出同代人思考的独到认识，父亲的死以及身边发生的一切，更加坚定了他反传统的意志与决心。可以说，观其一生，他的“反传统”的启蒙姿态是决绝而如一的。

鲁迅自幼接受传统教育，但他并没有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通常的解释是，那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大变革，他的家庭也遭遇大变故，经济条件的窘迫已不能为其继续学堂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于是，他就到南京进入不收学费的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我想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祖父科场案”的阴影和父亲科举失败带来的身心压力，让鲁迅看清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从而决定另寻他途。《呐喊·自序》中，鲁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我要去 N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生活。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 8 元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认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在学校里，他的苦闷并没有消除，学堂表面上讲维新，实际上沿袭着旧制，所谓中体西用。《左传》是不得不读的，作文题目也还是《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之类的老套。好在他开始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反叛意识进一步增强。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时的鲁迅有“尚武”思想，希图通过“侠”的精神追求超越自我所限，玉成社会之大变、思想之开放，他开始用“戛剑生”、“戎马书生”别号来写一些文章。这种尚武任侠的精神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还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兼具“排满”意志和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主义思想。鲁迅曾言：“倘说影

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① 感触之深不言而喻，“排满”、“抗敌”，哪一个不需要强力做支撑呢！

1902年，受清廷“要维新，必去异域”国策影响^②，江南大量选派官费留学生赴日学习“明治维新”经验，鲁迅由学校推选来到日本留学。当时，国人西学，多以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论”。鲁迅之所以没有延续他在南京的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的学业，而是选择学医，是与父亲的病故有关，《呐喊·自序》中，他说，初衷是“治父亲一样的病，战时好当军医”。但是，“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如果说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只是从亲情角度、人生角度让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和传统的滞重凝涩，他心头尚残存有粉红色的梦，那么幻灯片事件则彻底地击碎了他的最初的朴素主义想法——治疗像父亲一样的病人，进而实现“健康国民”一梦。他开始从精神上着手，改变国人的灵魂，重塑国民的性格。从此，鲁迅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巨的国民性批判之路。尽管这是一项浩大的精神工程，迟至今日尚未完成，但是鲁迅终其一生都为之奔走呼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影像。

鲁迅曾按自然年代来划分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从清末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可以分为四代：寿镜吾属老式文人，自己走的是科举考试一途，希冀学生也走这一路径。东京学习时，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古文字学，虽然古文字学看起来与社会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那时想复兴中国文化、抵抗异族压迫的青年人来说，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同时，鲁迅还从章太炎那里接受了张扬个性、批判保守主义的革命

①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② 张之洞即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思想。虽然，师生交往时间不长，后又因为政见不同而渐行渐远，但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一直很高，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称赞章太炎不仅是一位有学问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排满的“革命家”^①。冯雪峰曾回忆：“有一天，我们谈着，说到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②鲁迅先生还表达了准备写一部以四代知识分子命运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的愿望，他甚至对冯雪峰说，这项工作只有他这样经历的人来做，如果他不写，前两代将来恐怕也没有人能写了。从这里，也能见出鲁迅对先驱者的尊重和对后来者的期许。

综观鲁迅一生，虽然没有直接在高等学校任教，但一直都与教育界保持紧密关系，知识分子谱系始终没有间断，“五四”时期，以小说和杂文创作登上文坛的他，与同辈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创办《新青年》，呼唤“闯将”和“勇士”，“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令鲁迅失望的是，“闯将”、“勇士”非但没有出现，《新青年》同仁倒是提前星散，寄予希望的青年们不仅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反而沾染上旧社会的污秽，干起食肉寝皮的勾当来。

对于青年，鲁迅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寄希望于青年，认为在荒漠一样的中国，需要敢于呐喊的青年人，愿意把作品献给那些不惮于前驱的猛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己从旧社会走来，身上还带有旧社会的东西，不愿意影响富有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人，使他们趋于消沉。杂文集《坟》的后记中，他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页。

②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能算是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一钱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

“五四”前后，得到鲁迅帮助和指点的青年很多，安徽籍的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河南籍的尚钺；山西籍的高长虹；浙江籍的孙伏园、许钦文；四川籍的陈炜谟、陈翔鹤；河北籍的冯至；湖南籍的向培良……与他们交往，鲁迅感到些许的充实，但当看清楚他们本来面目之后，又生出许多的悲哀。

许钦文：1920年，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小说创作多得鲁迅指导，待有起色，鲁迅又为之编选小说集，销售甚好，名声渐大，有出版商找到他，劝他把编选掉的小说再集合起来出版，他照办了。鲁迅看后，叹息说：“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养，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①在名利面前，学生并不领鲁迅的情。

高长虹：1925年，在鲁迅帮助下，与向培良等人创办“狂飙社”，出版“狂飙丛书”。事后，高长虹却说，鲁迅把他的好作品选掉了，留下了坏的。这使鲁迅非常气愤^②。未名社与狂飙社发生矛盾，鲁迅处于两派之间，调解时引起一些人误会。高长虹便大肆攻击鲁迅，否认之前鲁迅帮助他出版丛书之实，称鲁迅别有用心，借机捞取“思想界权威”、“青年叛逆领袖”之誉。

青年的幼稚和背叛令鲁迅大为失望，加之到了厦门、广州，他亲眼目睹了青年人的革命狂热和种种恶行，几乎动摇了他之前的信念，《三闲集》序言中，他说：“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青年‘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

①②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1938年10月16日。

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①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定居上海的日子里，虽然他仍对青年寄予厚望，但明显多了一份戒备之心。为了避免卷入文坛纷争，他与青年的接触多用通信的方式，如萧军、萧红初到上海，提出要与他见面，他就不同意，在多次通信之后，才同意在内山书店见面。这里，固然有鲁迅性格上的多疑、敏感，但也有环境险恶的无奈。毕竟，在一个容易受伤害的环境里，自我保护是十分必要的。1934年12月16日，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叮嘱他“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用这种他曾经批判的世故方式来教育青年人，这在他无疑是悲哀的，与他初登文坛时倡导的粗糙的灵魂、敢说敢讲的“闯将”之风也是相悖的。

鲁迅晚年，虽然没有摆脱文坛的纷扰和论争，参与了梁实秋的人性论批判、第三种人批判以及“两个口号”之争，但总的来说，与青年的交往还是亲密的，身边不仅有瞿秋白、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叶紫、黄源、周文、巴金、吴朗西、聂绀弩、黎烈文、柔石、殷夫等青年，谈论文学，指导写作，而且还与他们的家人有一些往来，如瞿秋白夫妇、冯雪峰夫妇、萧军、萧红夫妇。他们的存在，多少排遣了此一时期鲁迅内心的苦闷和寂寞。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中有许多还传承了“五四”启蒙精神，走上了国民性批判之路，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更是成为鲁迅一生的朋友，可以交换思想感情的知己。

第二节 “兄弟失和”与遭受围攻的日子

阅读鲁迅，时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压力，家庭的变故、婚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